

将引领一生的西方智慧大作

韦伯：人类社会经济史

RENLEISHEHUIJINGJISHI

韦伯 著 唐伟强 译



韦伯：人类社会经济史

韦伯 著 唐伟强 译

 中国学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韦伯：人类社会经济史 / (德) 韦伯 (Weber, M.)
著；唐伟强译.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 5
ISBN 978 - 7 - 5146 - 0435 - 1

I. ①韦… II. ①韦… ②唐… III. ①经济史 - 西方
国家 IV. ①F15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2664 号

韦伯：人类社会经济史

出版人：田辉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 话：010 - 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 - 88417409 (版权部)
010 - 68469781 (发行部) 010 -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bh1985@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三河德利印刷厂

监 印：傅崇桂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16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46 - 0435 - 1

定 价：2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导 读



▲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与马克思、杜尔凯姆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凯姆遵循着孔德的方式，以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进行研究。而韦伯以及他的同僚维尔纳·宋巴特（也是德国社会学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纳的则是反实证主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始了反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界的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韦伯将其分类为传统行为、感情行为、目的理性行为和附带行为），不可能用传统自然科学的方式加以研究。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知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在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上的研究。韦伯关于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定义，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在各种学术上的重要贡献通常被通称为“韦伯命题”。

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他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他的主要著作围绕于社会

实证主义又称实证论，其中心论点是：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实证论者认为，虽然每个人接受的教育不同，但他们用来验证感觉经验的原则并无太大差异。实证主义的目的是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

孔德认为人类非生而知道万事万物，必须经由学习过程，从不同的情境中获得知识。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感觉、推知或体认经验，并且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推论还没有经验过的知识。超越经验或不是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

爱米尔·杜尔凯姆出生于1858年4月15日的法国洛林，逝世于1917年10月15日。法国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他两位是马克思及韦伯），主要著作有《自杀论》、《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等。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法国经济社会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这个书名中，“地中海”是布罗代尔的强项，“考古”却只是布氏学术脉络中枝叶上的枝叶。布罗代尔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简称《地中海》）、《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提醒着我们，他研究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距离史前史和古代史十万八千里。

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上，但他也对经济学的领域作出极大的贡献。这部《人类社会经济史》（有译《社会经济史》，但韦伯的理论是站在关注全人类的高度来阐述社会经济的历史规律，因此译为《人类社会经济史》更合适）。是在韦伯去世后，在韦伯遗孀玛莉安妮的主持下，由两位德国学者赫尔曼和帕尔义根据他1919—1920年第一学期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课程时学生们的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韦伯大部分著述都是以这种方式出版的）。此书是他关于政治经济学与宗教社会学的又一力作，主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产生和演变史，并对韦伯、布罗代尔、诺思以及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和历史观进行比较。如果说马克思主要致力于从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的话，诺思则反过来从私有产权关系的确立和建构来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如果说布罗代尔打算从历史上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来再现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产生过程的话，韦伯则更倾向于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来探寻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资源。这里，不管历史学家如何在自己的文本中再现历史，也不管思想家从自己的知识论背景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却早已是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现象。韦伯在这本书中延续了他最著名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中的许多看法，比如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韦伯的这部《人类社会经济史》现代主要涉及西方从中世纪至现代社会的历史，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等极其细致而繁杂的方面，大致的章节概述如下——

本书第一章“家庭、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探讨的重点包括农业组织与农业共产制问题、财产制度与社会

团体、领主财产制的形成，庄园制度、资本主义入侵前欧洲各国的农民状况以及庄园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段时间的历史一直追溯到欧洲各国氏族公社时代，当时欧洲各地农业组织尚处在农业共产主义的原始体制下，但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结构与组织形式。及自 16、17 世纪，耕地的变换产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济，在其所有的领地中公司责令村落、团体对米、烟草的纳贡负连带责任，强制个人留居村落之内。19 世纪连带责任制崩溃，强制性的村落团体也被废止。在德意志，当庄园领主成为骑士后，因无法经营，于是将土地委让于农民，农民有连带责任。

本章还分析了社会团体的各种专有形式，以及领主财产制的产生与庄园制度。韦伯认为小家庭是家庭共产体的出发点，可发展为大规模的领主贵族，是农业所有制发展中的导体，也是庄园制度的导体。领主财产制也是建立在国家租税与服役制的基础上的。

然后详细探讨了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英国各国的封建所有制下不同的封建领主与农民以及农奴的关系。并指出在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互依关系在庄园农业制崩溃后才告结束。庄园制度崩溃的原动力始于庄园制度内部，主要是经济性的，直接的原因在于领主与农民的商业机会，对于市场的关心，以及由于货币经济中农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大。

第二章“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的工业与矿业”所讨论的主题包括工业经济组织的形态、工业与矿业的发展、手工业行会及欧洲行会的起源及崩溃。然后讨论工场生产以及矿业。在农业时代，工业是副业。中世纪的行会经济则是纯粹的手工业，缺乏设备是其主要特征。一旦固定资本出现，行会经济就有崩溃的危险。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出发点是生产小家族或大家族自身需要的家庭工业，由此



▲宋巴特, Werner Sombart (1863—1941), 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63年1月19日生于德国的埃姆斯莱本, 1941年5月18日卒于柏林。宋巴特曾与韦伯参加创立德国社会学会的工作, 并合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现代资本主义》(1902)、《犹太人与经济生活》(1911)、《资本主义》(1930)和《新社会哲学》(1934)等。

宋巴特早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后受到韦伯和历史主义的影响。他认为, 社会学不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 而是一门有明确内容和特殊方法的独立学科, 其任务在于提出有关精神领域的社会联系的理论。他反对人文科学中的价值取向, 主张价值中立。

宋巴特对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贡献集中在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他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社会结构, 特别是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精神, 并把资本主

出发可发展为部落工业, 再推广为纯粹营利的企业, 先由家庭经济扩展至市场经济, 因而产生流动的商业。

第三章“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及交换”指出, 发达的商业环境是引入资本主义的通路。本章主要探讨前资本主义时代代表商业活动的商品及交换。具体内容包括: 商业发展的出发点及其技术的先决条件、商业运输及商业组织形式、商业经济经营形式及商人行会、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货币、银行与利息。

第四章“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探讨近代资本主义的意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最初大投机恐慌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温床。进而探讨自由批发商的角色、16至18世纪的殖民政策、工业经营技术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形成、合理的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韦伯指出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以下条件: (1) 一切生产的物质手段私有, 成为私人营利企业可自由支配的财产。(2) 市场自由。(3) 有高度计算的可能性。(4) 有合理的即可计算的法律。(5) 自由劳动的存在。(6) 经济生活的商业化, 商业化是资本主义的特征, 而投机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并且通过历次投机危机的事实分析了非合理资本主义的弊端。由此讨论了克服非合理资本主义而需要考察的几个方面: 自由批发商业、16至19世纪的殖民政策、工业经营技术的发展、市民阶级和城市、合理的国家与经济政策。最后站在其一贯的新教伦理的立场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对整个人类世界所具有的革命性的意义。

对于当代的中国读者而言, 如果没有深入的知识背景, 可能难以从整体上把握韦氏的主要观点与方法。但我们有一种很好的理解韦伯的办法, 那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名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此书重新讨论了“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它的历史生成过程, 其中对韦伯等

老一辈的社会经济学的观点给予了细致的分析与批判，可以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树立一个理解韦伯的参照标尺。他指出：

韦伯将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并为一谈。一方面韦伯提出路德提倡的上帝之召唤与加尔文的命定论，一样有个人主义的趋向，因为天主教徒过去崇信带有集体性格之良心，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已代之以匹夫匹妇个人为主义之良心。自此也不能全恃寺院修道作为获救的阶梯，各人之生计行业仍不能与信仰无关。路德尚只消极地以各尽所能乃系上天谕命。加尔文则鼓励各信徒设想本身已被选拔获救，于是事业上的成功乃系得到恩惠之象征，因之更积极进取。另一方面韦伯也根据富兰克林及英国非国教牧师巴克斯特的言行证实英美资本主义之兴起与清教徒之间有密切关系。

韦伯认为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述及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的氏族作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使其他各种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道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种魔术，它本身也逐渐减轻入世的行动。佛教在中国也同样被排斥。韦伯指出佛教因对女人情绪有特别感召的力量，以致成为宫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领导社会之力量。

但韦伯只是一个社会学家，其作品可视为文化人类学的论文，一般心理上的分析细腻，很适合用于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有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

义的发展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在探寻资本主义发生的原因时，他认为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新教伦理来源于犹太教。他还用经验方法考察了犹太人的宗教伦理、法律制度、生活方式和经济生活。他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时常常摇摆于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

康孟达（Commeda）又译“康曼达”。劳资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与家族共同经营不同。依照这种契约，一方出资而不参加营业活动，另一方则运用自己的设备条件等从事营业活动。双方按出资数额对盈利进行分配。出资者依出资数额对经营亏损负有限责任，而营业者则负无限责任。这种共同经营形式，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诸城市。最初盛行于海上贸易，由既想获得利益而又不愿亲身冒险的资本家出资，由航海者向海外运销货物，盈利按出资额分配。亏损时，航海者承担无限责任，资本家只在出资范

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后来，这种合伙形式逐渐发展到陆上贸易，最终演变成成为隐名合伙和两合公司。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社会力量一扫而光，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与体系，以“资本主义”称之。其中又以加尔文教派为盛，并以其战斗力量与旧有力量周旋。所以历史上提到“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必有其互相衔接之处。但是若以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即可概括全部除旧布新的运动，或可以推测以后社会新组织的全貌，则不免过度将问题简化。

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威尼斯时并无新教渗入。以后相继推及于法国及比利时，这些国家至今皈依天主教。荷兰独立战争之领导者“威廉寡言”原奉天主教，在革命过程中先入路德教派，后又改信加尔文派，所以到底是新教伦理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抑或它不过是革命战争中被利用而成为一种工具？这种种问题，就使韦伯的理论发生了罅隙。韦伯也体会到新教伦理不能凭空存在。资本主义能推行，法治的维持为首要工作，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可是作者亦以为现代商业法律也是由新教思想体系孕育而成，则不免张冠李戴。

事实上现代商法虽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的根源上，但主要的仍是在中世纪经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实用而产生。要等到西欧各国商业展开，法治基础成熟，逐渐抄袭沿用。是故民法、商法和法治理论并不会因某种精神而产生，却会因物质生活的推广而增进。由此也可以看出韦伯等过度强调理想主义的弊病。韦伯亦了解他自己的理论施用起来必有限度。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基于新教伦理即使在金钱堆中仍有硬干苦干，顶天立地，道德升华的观感。在他看来只有如是才算合理。他也提到：“当然这种观念不仅曾在资本

主义之条件下存在。我们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追溯到它的根源。我们更不能说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各个人包括企业家及劳工仍在自信地保持着这些伦理信条。今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庞大的宇宙，各个人出生于其中，它将许多不能更变的事物交付给他，他只能与之共存。当各个人牵涉到市场关系的时候，他只能就范于资本主义的条规。要是制造者长久违反着这些成例，他必在经济生活之中被淘汰，有如工人不使自己迁就于这些成例，则必会失业而踽踽于街头。”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作者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全是两回事，它们虽可以在某种条件下异途而同归，却不见得会共存亡。我们企图以最经济的眼光来了解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展开的全貌时，若跟随韦伯则很难找到适切的途径，很可能因为他的唯心主义而被带入歧途。

黄仁宇对于韦伯的批评，至少可以算做是一家之言，他的“大历史”观与当今主流的“叙事史学”的方法给了我们理解关于韦伯的一个清晰而生动的脉络，由此我们再去读韦伯的著述时，便不至于掉进大量的细节中去。

概念通释

一、基本概念

1. 一种行为，只要它的目的在于追求希望得到的效用或者是运用这种效用的机会，我们都可以统称之为“经济的”。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可有经济的目的，比如艺术家的行为。即使是战争，就其准备以及作战上有经济的目的与手段而言，也可以说它是“经济的”。但就这个词本来的意义而言，则所谓“经济”，只能是和平运用这种效用的能力，这种能力原以经济为目的。这种运用的特征之一是自己的劳动力的运用。在皮鞭下工作的奴隶，只不过是主人的工具，只是经济手段，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经济目的。工厂中的工人也是如此，当他们为自己谋生工作时，虽然也是经济的目的，但在工厂中只是技术的劳动工具而已。和平性的特征也是必要而不可少的。因为，各种事实上的暴力（如掠夺、战争、革命），虽也有以经济为目的的，但必然受其他法则的支配，与用和平手段的追求不同。不过以以往的历史经验来考察，每种经济背后必须有强制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在今天是国家性的强制，在古时则有身份阶级的强制，将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实现时，对于经济计划的实行可能还是会用强制手段。

然而这种暴力我们不能称之为“经济性的”，只是经济的经营手段而已。而且经济性常常与手段的稀少性成正比，并且这种手段有经济的目的，这也是很重要的：要满足追求效用的欲望，必须将有限的手段有效地使用。因此，就有经济行为合理化的倾向（虽然未必能彻底），说到最后我们便知道所谓的“经济”这种东西，是出于自己的运用能力而归于统一的行为，这种行为被追求效用及效用机会所决定。也就是说，当某个“经济统一体”（经济团体）它的行为对外部多少数量的决定，是该团体自我形成的，就是一种自律的团体，也就是它的领导人的决定，是以经济为目的的团体，它的运作不带有偶然性，而是有着连续不断的必然性。最重要的是“原为经济目的”的这一个属性，这也就是使经济团体获得“经济”的特征之处。其他的团体也一样，虽然要涉及经济生活，但本身并不是经济团体。这样的团体中，有的原以其他为目的，经济目的仅仅是附带而已（有经济作用的团体），有的则完全与经济无关，但它所从事的工作在于使他人的经济行为遵从一般的规律，即“形式上使之规律化”（维持秩序的团体），或使具体的涉及经济的行为“在实质上体制化”（经济管制团体）。同一的团体，可因其所处情形，在这几种形态的范畴之内。

2. 经济行为所追求的目的可有下列种种：（1）将可以运用的效用，a. 就现在与未来之间，b. 就现在各种可能的使用方法之间，有计划地进行分配。（2）将不能直接享用但可运用的财务，有计划地实现这种目的（这就是“生产”）。（3）在其他的经济运用能力下的效用，不问其是否已可享用，设法取得对于这种效用的运用能力或共同运用能力。在最后一个方面，如果要适合于经济的意义而以和平方法来运用它，那么它的手段在于组织经济管制团体（以有使用资格的人组织），或者可以用于交换。

经济管制团体可有不同种类：其一为管理的团体（“计划经济”）。它指的是一个统一的经济指导机构，也就是经济统一体所组成的一个集团，服从一个领导有计划的指导，而所谓有计划，则指的是对于效用的获得、使用或分配而言（如世界大战时的“战时经济”组织）各个个体经营，参加了这个团体后，其行为就要以这个领导的计划为目的而进行。其二是占有的团体。这个团体对于各个个别的行动虽无统一的指导，但仍占有各个经济团体的经济条件，使其间没有相互竞争发生。因此最重要的方法，是消费的合理化以及获得的合理化。如渔业合作、畜牧合作、种植合作、同业组合等，均为合理化的实例，其中有关于原料的问题，也就是关于销售机会的问题，因而间接成为消费的合理化。近代的同业联盟就常属于这一类。

交换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偶然的交换，这是交换最古老的形态了。这就是将剩余物偶然地拿出去交换，但生活的重心仍在于自己所生产的物品。其二为市场交换，其趋向可见于这样的事实，即全部都为交换而提供；同时也全部都为交换而需要。也就是说，其目的在于市场机会的存在。凡市场交换支配经济的地方，我们就称之为交换经济的根本。

一切交换均基于人与人间之和平的斗争，这就是基于价格的斗争、机遇（对于交换的对方来说）以及竞争（对于处在同一交换企图下的人）上，而向一种协调进行，这种协调使参与者中的一方或数方有利，而斗争便终结。

交换可受形式的法则的制约，如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之下就是如此，但也可受实质的制约（真正受制约的交换），其制约者可以是同业组合、垄断的企业家、君主等，其目的手段相互间会完全不同（例如价格调节，为人民的

生活，等等)。

交换可分为自然交换与货币交换两种。到了货币交换时，使行为完全受市场机会调控在技术上才开始成为可能。

3. 交换手段是一种物品以特殊的形态（即循环不断而且大量的）用于交换的时候，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大家都预见到这种物品是可以再用于交换的。交换手段与支付手段并不是无条件一致的。因为支付手段最先是偿付义务，即履行债务的一定的手段而已。但是各种债务，不一定都由买卖交换而发生，如租税、纳贡、嫁妆、礼品等债务，便是其例，过去经济史上所曾有过的各种支付手段，并不每种都是交换手段。例如在非洲牛是支付手段，但不是交换手段。就是在交换手段作为通行的支付手段的地方，也不是一切的交换手段都可无限制地当作支付手段。蒙古的可汗命令其臣民使用纸币，但在租税上却不收纸币。对于各种各样的报税，也不是每种支付手段都可作支付手段。如奥地利曾有某种铸币，只能用于关税支付。历史上，各种交换手段也不能对于所有的交换，都可作为交换手段来使用。例如在非洲，用贝壳货币不能买到妇女，只有用牛才能买到。

货币是一种支付手段，在某一人群中也是交换手段，因而可以按其各自的价值而将它分割开，于是形成可以计算的支付手段。但是这种技术上的作用与货币特定的外形是没有关系的。如汉堡银行货币的基金，实际是脱胎于中国的某种设施，只要有银的准备便可，至于银的形态怎样，这是不须过问的。但因此而发行的汇票，则为货币。

没有使用货币的经济叫做自然经济，反之，使用货币的经济叫做货币经济。

自然经济可以是一种不用什么交换就能满足其需要的经济。例如地主所需要的物资，可通过转嫁于农民经济的方法而得到，自足的家庭经济也是如此。但是纯粹的自然

古埃及到了29、30王朝才出现货币，主要是模仿古希腊。古埃及货币在托勒密王国时期大放异彩。之前，古埃及没有货币，但是有货币单位，叫德本，这也是重量单位，一般将商品估价为德本，然后付钱或物物交换。

经济已成为很少的例外。自然经济之中也可具有经济的交换，但完全没有货币，这就是自然的交换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从没有完全形成过，只出现过接近这种情况的情况。在古代埃及有时候曾施行过与自然交换并行的货币计量经济。这就是说在物物交换之前，先把两物用货币来计量过，然后作交换。

货币经济能把交换中的双方，在人与时间的方面分离开，使物的交换手段相互调和的问题得到解决，因此，市场扩张即市场机会的扩张才有可能。由现在的情况来预测将来的市场状况，使经济的行为不致受一时的情况束缚，这样的预测也须把交换双方的机会，用货币来估计后才能办到。货币的这种职能，就是使计算成为可能的职能，因我们有一套共通的标准，可将一切的财产都以此作为准则，这是其最大的意义。因为要通过货币，行为的计算的合理性才有了前提，“计算”才有可能性。计算一方面能使“营利经济”完全以市场机会为目的，同时对于“谋生”方面，也可使它的“经济计划”（关于可运用的货币额的使用者）按照这项货币额的“最高效用”的尺度来施行。

4. 一切经济的两个基本形态——为谋生与营利，这两者常因许多中间阶段而得以互相结合，但就其纯粹的形态而言，则是在概念上互为对立的。所谓谋生，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目的的“经济的事”，不考虑它是否满足国家的需要、个人的需要或消费团体的需要。反之，所谓营利则其目的在利益获得的机会，尤其在于交换的利益获得的机会。谋生的范畴在货币经济存在时指财产及所得。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出自然所得与自然所有。但所得与财产，必须能用货币来估计后才有一种公分母。而且我们必须以交换经济（货币经济为其目的）为基础，而后能将当作统一体的财产提出来。就这种意义而言，可知所谓所得，是指

能用货币以估计的特定的财产分量，在一定期间内得以运用的机会，反之，财产的意义，则为有货币价值的财产所有，可供谋生上长期使用，而且可用以获取所得者。最后可知所谓企业，是为获得交换利益而把市场机会当作目的而进行的一种营利经济。在这种意义上，“企业的事”，可以是偶然的企业，例如偶然的一次航海，是资本主义组合化初期流行的形态，康孟达（Commenda，一种商业契约，是资本所有者与船舶所有者或经营者合作的合伙形式）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或是为了继续的经营。一切的企业，其目的都倾向于收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于追求超过企业所用手段的货币价值以上的剩余。企业的事，进行时也必须当作资本计算，就是由租佃对照表作扣除清算各种开销的方式，也因此而成为计算的对象，即成为交换利益获得机会的计算对象。什么是资本计算？这就是把财产按其货币的估计价值，拿到企业之中，到企业终结后或一个结算期之末（把资本最初的价值和最终的价值相比较），用货币来确定利益获得或损失。资本计算普及后，财产的交流与生产，即以资本计算作为目的而进行，因而也就是以市场机会作为目的而进行。

谋生和营利经济，现在已分离而成为个别的连续行为。在14、15世纪时，例如在美第奇家族，谋生和营利经济的分离还没有实现。但在今天，两者的分离已成为原则。而且谋生和企业经营，不仅仅是在外形上的分离。在记账上，即在计算上，这种分离尤为明确，租佃对照表的格线上，必须有利益获得表现出来才能流入各个谋生的方面，这无论在个人的企业或是在股份公司上都是如此的。营利经济与谋生在根本上并不相同，因为营利经济不像谋生那样以最高效用为目的，而是以收益可能性为目的（收益可能性的实现，则也要依赖于最后的消费者追求的最高效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家族经济上的货币计算、结局和营利

美第奇家族（Medici），或译为梅第奇家族、梅迪奇家族、麦地奇家族，是佛罗伦萨13世纪至17世纪时期在欧洲拥有强大势力的名门望族。美第奇家族的财富、势力和影响源于经商、从事羊毛加工和在毛纺同业公会中的活动。然而真正使美第奇发达起来的是金融业务。美第奇银行是欧洲最兴旺和最受尊敬的银行之一。美第奇家族以此为基础，开始是银行家，进而跻身为政治家，教士，贵族，逐步走上了佛罗伦萨，意大利乃至欧洲上流社会的巅峰。美第奇家族奖掖文化，搜集大批图书及手稿，藏在被称为柏拉图学园的别墅中，并对公众开放。网罗米开朗琪罗等著名艺术家。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下，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均有突出成就，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等的研究也居于意大利各邦前列。事实上，许多大师的作品，本是美第奇家族的收藏；有不少画像和雕刻，就是为这个家族的成员而作，甚至展品最主要的来源佛罗伦萨乌菲济美术馆，也是这个家族的遗产。



经营同样的必须依赖市场机会，就是依赖于人和人之间的和平竞争。因此，货币不像其他的测量工具那样，是毫无危险的尺度，而货币价格才成为从市场上斗争机会中产生出来的协调，资本计算上所不可缺的评价标准于是仅能从市场上人和人的斗争中获得，所以货币经济有“形式的”合理性，与一切“自然的”经济（不论是自给经济或交换经济）都不相同。所谓货币经济的形式的合理性，也就是最大限度的“计算可能性”，对于已实现或在将来能期待的利益获得机会及损失机会，有完全的计算可能性。资本计算所有形式上的合理的作用，无法用其他的计算方法来代替，而且就用将“普遍的统计”代替计算，这是社会主义所提出的非常发达的自然计算也不能取代的。如果要将资本计算废除，那么其合理之处必须发明一种技术的手段来取代它，而货币及货币价格在使用所尽的很便利的公分的任务，也可以由此手段来获得。

二、经济功能的分类

现代经济生活的根本事实在于职业的分类，也就是在于人类的职业分化。

在经济科学上，职业的意义，是指以生计或营利为基本，由一个人将劳动力继续施展出来的意思，职业可在一个团体（如庄园、乡村、城市）的内部进行，也可以为市场（如劳动市场、财产市场）的交换而进行。职业编制未必常常存在，纵然有，也未必有今天这样大的范围。

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的贡献可分成为管理的贡献及实行的贡献二者。我们把后者叫做劳动，把前者叫做对于劳动的管理。劳动管理的种类有多种。从技术上来看，则各种贡献（在一种经济内）的如何分配于各个的劳动者及其相互的关系，可作为分类的根据。从经济的角度来